

深圳学派建设丛书

(第五辑)

后冲突时代的 国际法治及大国责任

吴燕妮 著

The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and Great Power
Responsibility in the Post-Conflict Era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深圳学派建设丛书

(第五辑)

后冲突时代的 国际法治及大国责任

吴燕妮 著

The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and Great Power
Responsibility in the Post-Conflict Era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后冲突时代的国际法治及大国责任 / 吴燕妮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5
(深圳学派建设丛书. 第五辑)
ISBN 978 - 7 - 5203 - 2432 - 8

I. ①后… II. ①吴… III. ①国际法—研究②中外关系—
研究 IV. ①D99②D8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78247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马 明
责任校对 任晓晓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 //www. csspw. cn](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1
插 页 2
字 数 312 千字
定 价 8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深圳学派建设丛书》
编委会

顾问：王京生

主任：李小甘 吴以环

执行主任：陈金海 张骁儒

总序：学派的魅力

王京生*

学派的星空

在世界学术思想史上，曾经出现过浩如繁星的学派，它们的光芒都不同程度地照亮人类思想的天空，像米利都学派、弗莱堡学派、法兰克福学派等，其人格精神、道德风范一直为后世所景仰，其学识与思想一直成为后人引以为据的经典。就中国学术史而言，不断崛起的学派连绵而成群山之势，并标志着不同时代的思想所能达到的高度。自晚明至晚清，是中国学术尤为昌盛的时代，而正是在这个时代，学派性的存在也尤为活跃，像陆王学派、吴学、皖学、扬州学派等。但是，学派辈出的时期还应该首推古希腊和春秋战国时期，古希腊出现的主要学派就有米利都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埃利亚学派、犬儒学派；而儒家学派、黄老学派、法家学派、墨家学派、稷下学派等，则是春秋战国时期学派鼎盛的表现，百家之中几乎每家就是一个学派。

综观世界学术思想史，学派一般都具有如下特征：

其一，有核心的代表人物，以及围绕着这些核心人物所形成的特定时空的学术思想群体。德国 19 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兰克既是影响深远的兰克学派的创立者，也是该学派的精神领袖，他在柏林大学长期任教期间培养了大量的杰出学者，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学术势力，兰克本人也一度被尊为欧洲史学界的泰斗。

其二，拥有近似的学术精神与信仰，在此基础上形成某种特定的学术风气。清代的吴学、皖学、扬学等乾嘉诸派学术，以考据为

* 王京生，现任国务院参事。

治学方法，继承古文经学的训诂方法而加以条理发明，用于古籍整理和语言文字研究，以客观求证、科学求真为旨归，这一学术风气也因此成为清代朴学最为基本的精神特征。

其三，由学术精神衍生出相应的学术方法，给人们提供了观照世界的新的视野和新的认知可能。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代表着一种新型文化研究范式的英国伯明翰学派，对当代文化、边缘文化、青年亚文化的关注，尤其是对影视、广告、报刊等大众文化的有力分析，对意识形态、阶级、种族、性别等关键词的深入阐释，无不为我们认识瞬息万变的世界提供了丰富的分析手段与观照角度。

其四，由上述三点所产生的经典理论文献，体现其核心主张的著作是一个学派所必需的构成因素。作为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弗洛伊德所写的《梦的解析》等，不仅成为精神分析理论的经典著作，而且影响广泛并波及人文社科研究的众多领域。

其五，学派一般都有一定的依托空间，或是某个地域，或是像大学这样的研究机构，甚至是有着自身学术传统的家族。

学派的历史呈现出交替嬗变的特征，形成了自身发展规律：

其一，学派出现往往暗合了一定时代的历史语境及其“要求”，其学术思想主张因而也具有非常明显的时代性特征。一旦历史条件发生变化，学派的内部分化甚至衰落将不可避免，尽管其思想遗产的影响还会存在相当长的时间。

其二，学派出现与不同学术群体的争论、抗衡及其所形成的思想张力紧密相关，它们之间的“势力”此消彼长，共同勾勒出人类思想史波澜壮阔的画面。某一学派在某一历史时段“得势”，完全可能在另一历史时段“失势”。各领风骚若干年，既是学派本身的宿命，也是人类思想史发展的“大幸”：只有新的学派不断涌现，人类思想才会不断获得更为丰富、多元的发展。

其三，某一学派的形成，其思想主张都不是空穴来风，而有其内在理路。例如，宋明时期陆王心学的出现是对程朱理学的反动，但其思想来源却正是前者；清代乾嘉学派主张朴学，是为了反对陆王心学的空疏无物，但二者之间也建立了内在关联。古希腊思想作为欧洲思想发展的源头，使后来西方思想史的演进，几乎都可看作

是对它的解释与演绎，“西方哲学史都是对柏拉图思想的演绎”的极端说法，却也说出了部分的真实。

其四，强调内在理路，并不意味着对学派出现的外部条件重要性的否定；恰恰相反，外部条件有时对于学派的出现是至关重要的。政治的开明、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交通的发达、移民的会聚等，都是促成学派产生的重要因素。名震一时的扬州学派，就直接得益于富甲一方的扬州经济与悠久而发达的文化传统。综观中国学派出现最多的明清时期，无论是程朱理学、陆王心学，还是清代的吴学、皖学、扬州学派、浙东学派，无一例外都是地处江南（尤其是江浙地区）经济、文化、交通异常发达之地，这构成了学术流派得以出现的外部环境。

学派有大小之分，一些大学派又分为许多派别。学派影响越大分支也就越多，使得派中有派，形成一个学派内部、学派之间相互切磋与抗衡的学术群落，这可以说是纷纭繁复的学派现象的一个基本特点。尽管学派有大小之分，但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发挥的作用却各不相同，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如，法国百科全书派破除中世纪以来的宗教迷信和教会黑暗势力的统治，成为启蒙主义的前沿阵地与坚强堡垒；罗马俱乐部提出的“增长的极限”“零增长”等理论，对后来的可持续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等理论与实践，以及联合国通过的一些决议，都产生了积极影响；而德国人文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采尔所创立的人类地理学理论，宣称国家为了生存必须不断扩充地域、争夺生存空间，后来为法西斯主义所利用，起了相当大的消极作用。

学派的出现与繁荣，预示着一个国家进入思想活跃的文化大发展时期。被司马迁盛赞为“盛处士之游，壮学者之居”的稷下学宫，之所以能成为著名的稷下学派之诞生地、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主要场所与最负盛名的文化中心，重要原因就是众多学术流派都活跃在稷门之下，各自的理论背景和学术主张尽管各有不同，却相映成趣，从而造就了稷下学派思想多元化的格局。这种“百氏争鸣、九流并列、各尊所闻、各行所知”的包容、宽松、自由的学术气氛，不仅推动了社会文化的进步，而且也引发了后世学者争论不休

的话题，中国古代思想在这里得到了极大发展，迎来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黄金时代。而从秦朝的“焚书坑儒”到汉代的“独尊儒术”，百家争鸣局面便不复存在，思想禁锢必然导致学派衰落，国家文化发展也必将受到极大的制约与影响。

深圳的追求

在中国打破思想的禁锢和改革开放 30 多年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在国际上的和平崛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在进行。文化是立国之根本，伟大的复兴需要伟大的文化。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加快建设文化强国，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梦想正在逐步实现。可以预期的是，中国的学术文化走向进一步繁荣的过程中，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派也将出现在世界学术文化的舞台上。

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到人生观、文化观的大讨论，再到 90 年代以来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以及近年来各种思潮的争论，凡此种种新思想、新文化，已然展现出这个时代在百家争鸣中的思想解放历程。在与日俱新的文化转型中，探索与矫正的交替进行和反复推进，使学风日盛、文化昌明，在很多学科领域都出现了彼此论争和公开对话，促成着各有特色的学术阵营的形成与发展。

一个文化强国的崛起离不开学术文化建设，一座高品位文化城市的打造同样也离不开学术文化发展。学术文化是一座城市最内在的精神生活，是城市智慧的积淀，是城市理性发展的向导，是文化创造力的基础和源泉。学术是不是昌明和发达，决定了城市的定位、影响力和辐射力，甚至决定了城市的发展走向和后劲。城市因文化而有内涵，文化因学术而有品位，学术文化已成为现代城市智慧、思想和精神高度的标志和“灯塔”。

凡工商发达之处，必文化兴盛之地。深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排头兵”，是一个商业极为发达、市场化程度很高的城市，移民社会特征突出、创新包容氛围浓厚、民主平等思想活跃、信息交流的“桥头堡”地位明显，是具有形成学派可能性的地区之

一。在创造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发展奇迹的同时，深圳也创造了文化跨越式发展的奇迹。文化的发展既引领着深圳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激励着特区建设者艰苦创业，也丰富了广大市民的生活，提升了城市品位。

如果说之前的城市文化还处于自发性的积累期，那么进入新世纪以来，深圳文化发展则日益进入文化自觉的新阶段：创新文化发展理念，实施“文化立市”战略，推动“文化强市”建设，提升文化软实力，争当全国文化改革发展“领头羊”。自2003年以来，深圳文化发展亮点纷呈、硕果累累：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计之都”“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称号，原创大型合唱交响乐《人文颂》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成功演出，被国际知识界评为“杰出的发展中的知识城市”，三次荣获“全国文明城市”称号，四次被评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地区”，“深圳十大观念”影响全国，《走向复兴》《我们的信念》《中国之梦》《迎风飘扬的旗》《命运》等精品走向全国，深圳读书月、市民文化大讲堂、关爱行动、创意十二月等品牌引导市民追求真善美，图书馆之城、钢琴之城、设计之都等“两城一都”高品位文化城市正成为现实。

城市的最终意义在于文化。在特区发展中，“文化”的地位正发生着巨大而悄然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还不在于大批文化设施的兴建、各类文化活动的开展与文化消费市场的繁荣，而在于整个城市文化地理和文化态度的改变，城市发展思路由“经济深圳”向“文化深圳”转变。这一切都源于文化自觉意识的逐渐苏醒与复活。文化自觉意味着文化上的成熟，未来深圳的发展，将因文化自觉意识的强化而获得新的发展路径与可能。

与国内外一些城市比起来，历史文化底蕴不够深厚、文化生态不够完善等仍是深圳文化发展中的弱点，特别是学术文化的滞后。近年来，深圳在学术文化上的反思与追求，从另一个层面构成了文化自觉的逻辑起点与外在表征。显然，文化自觉是学术反思的扩展与深化，从学术反思到文化自觉，再到文化自信、自强，无疑是文化主体意识不断深化乃至确立的过程。大到一个国家和小到一座城市的文化发展皆是如此。

从世界范围看,伦敦、巴黎、纽约等先进城市不仅云集大师级的学术人才,而且有活跃的学术机构、富有影响的学术成果和浓烈的学术氛围,正是学术文化的繁盛才使它们成为世界性文化中心。可以说,学术文化发达与否,是国际化城市不可或缺的指标,并将最终决定一个城市在全球化浪潮中的文化地位。城市发展必须在学术文化层面有所积累和突破,否则就缺少根基,缺少理念层面的影响,缺少自我反省的能力,就不会有强大的辐射力,即使有一定的辐射力,其影响也只是停留于表面。强大的学术文化,将最终确立一种文化类型的主导地位和城市的文化声誉。

近年来,深圳在实施“文化立市”战略、建设“文化强市”过程中鲜明提出:大力倡导和建设创新型、智慧型、力量型城市主流文化,并将其作为城市精神的主轴以及未来文化发展的明确导向和基本定位。其中,智慧型城市文化就是以追求知识和理性为旨归,人文气息浓郁,学术文化繁荣,智慧产出能力较强,学习型、知识型城市建设成效显著。深圳要建成有国际影响力的智慧之城,提高文化软实力,学术文化建设是其最坚硬的内核。

经过30多年的积累,深圳学术文化建设初具气象,一批重要学科确立,大批学术成果问世,众多学科带头人涌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经济特区研究、港澳台经济、文化发展、城市化等研究领域产生了一定影响;学术文化氛围已然形成,在国内较早创办以城市命名的“深圳学术年会”,举办了“世界知识城市峰会”等一系列理论研讨会。尤其是《深圳十大观念》等著作的出版,更是对城市人文精神的高度总结和提升,彰显和深化了深圳学术文化和理论创新的价值意义。

而“深圳学派”的鲜明提出,更是寄托了深圳学人的学术理想和学术追求。1996年最早提出“深圳学派”的构想;2010年《深圳市委市政府关于全面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意见》将“推动‘深圳学派’建设”载入官方文件;2012年《关于深入实施文化立市战略建设文化强市的决定》明确提出“积极打造‘深圳学派’”;2013年出台实施《“深圳学派”建设推进方案》。一个开风气之先、引领思想潮流的“深圳学派”正在酝酿、构建之中,学术文化的春天正

向这座城市走来。

“深圳学派”概念的提出，是中华文化伟大复兴和深圳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竖起这面旗帜，目的是激励深圳学人为自己的学术梦想而努力，昭示这座城市尊重学人、尊重学术创作的成果、尊重所有的文化创意。这是深圳30多年发展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表现，更是深圳文化流动的结果。因为只有各种文化充分流动碰撞，形成争鸣局面，才能形成丰富的思想土壤，为“深圳学派”的形成创造条件。

深圳学派的宗旨

构建“深圳学派”，表明深圳不甘于成为一般性城市，也不甘于仅在世俗文化层面上造点影响，而是要面向未来中华文明复兴的伟大理想，提升对中国文化转型的理论阐释能力。“深圳学派”从名称上看，是地域性的，体现城市个性和地缘特征；从内涵上看，是问题性的，反映深圳在前沿探索中遇到的主要问题；从来源上看，“深圳学派”没有明确的师承关系，易形成兼容并蓄、开放择优的学术风格。因而，“深圳学派”建设的宗旨是“全球视野，民族立场，时代精神，深圳表达”。它浓缩了深圳学术文化建设的时空定位，反映了对学界自身经纬坐标的全面审视和深入理解，体现了城市学术文化建设的总体要求和基本特色。

一是“全球视野”：反映了文化流动、文化选择的内在要求，体现了深圳学术文化的开放、流动、包容特色。它强调要树立世界眼光，尊重学术文化发展内在规律，贯彻学术文化转型、流动与选择辩证统一的内在要求，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推动深圳与国内外先进学术文化不断交流、碰撞、融合，保持旺盛活力，构建开放、包容、创新的深圳学术文化。

文化的生命力在于流动，任何兴旺发达的城市和地区一定是流动文化最活跃、最激烈碰撞的地区，而没有流动文化或流动文化很少光顾的地区，一定是落后的地区。文化的流动不断催生着文化的分解和融合，推动着文化新旧形式的转换。在文化探索过程中，唯一需要坚持的就是敞开眼界、兼容并蓄、海纳百川，尊重不同文化

的存在和发展,推动多元文化的融合发展。中国近现代史的经验反复证明,闭关锁国的文化是窒息的文化,对外开放的文化才是充满生机活力的文化。学术文化也是如此,只有体现“全球视野”,才能融入全球思想和话语体系。因此,“深圳学派”的研究对象不是局限于一国、一城、一地,而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密切关注国际学术前沿问题,并把中国尤其是深圳的改革发展置于人类社会变革和文化变迁的大背景下加以研究,具有宽广的国际视野和鲜明的民族特色,体现开放性甚至是国际化特色,也融合跨学科的交叉和开放。

二是“民族立场”:反映了深圳学术文化的代表性,体现了深圳在国家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它强调要从国家和民族未来发展的战略出发,树立深圳维护国家和民族文化主权的高度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加快发展和繁荣学术文化,尽快使深圳在学术文化领域跻身全球先进城市行列,早日占领学术文化制高点,推动国家民族文化昌盛,助力中华民族早日实现伟大复兴。

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不仅伴随经济的强盛,而且伴随文化的昌盛。文化昌盛的一个核心就是学术思想的精彩绽放。学术的制高点,是民族尊严的标杆,是国家文化主权的脊梁;只有占领学术制高点,才能有效抵抗文化霸权。当前,中国的和平崛起已成为世界的最热门话题之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发展速度为世界刮目相看。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在学术上,我们还远未进入世界前列,特别是还没有实现与第二大经济体相称的世界文化强国的地位。这样的学术境地不禁使我们扪心自问,如果思想学术得不到世界仰慕,中华民族何以实现伟大复兴?在这个意义上,深圳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学术都是短板,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匹配。而深圳作为排头兵,肩负了为国家、为民族文化发展探路的光荣使命,尤感责任重大。深圳的学术立场不能仅限于一隅,而应站在全国、全民族的高度。

三是“时代精神”:反映了深圳学术文化的基本品格,体现了深圳学术发展的主要优势。它强调要发扬深圳一贯的“敢为天下先”的精神,突出创新性,强化学术攻关意识,按照解放思想、实

事求是、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总要求，着眼人类发展重大前沿问题，特别是重大战略问题、复杂问题、疑难问题，着力创造学术文化新成果，以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新方法、新体系引领时代学术文化思潮。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完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当今中国时代精神的最权威、最凝练表达，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兴国之魂，是中国梦的核心和鲜明底色，也应该成为“深圳学派”进行研究和探索的价值准则和奋斗方向。其所熔铸的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家国情怀，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伟大目标和每个中国人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是“深圳学派”的思想之源和动力之源。

创新，是时代精神的集中表现，也是深圳这座先锋城市的第一标志。深圳的文化创新包含了观念创新，利用移民城市的优势，激发思想的力量，产生了一批引领时代发展的深圳观念；手段创新，通过技术手段创新文化发展模式，形成了“文化+科技”“文化+金融”“文化+旅游”“文化+创意”等新型文化业态；内容创新，以“内容为王”提升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价值，诞生了华强文化科技、腾讯、华侨城等一大批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企业，形成了读书月等一大批文化品牌；制度创新，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不断创新体制机制，激发全社会的文化创造活力，从根本上提升城市文化的竞争力。“深圳学派”建设也应体现出强烈的时代精神，在学术课题、学术群体、学术资源、学术机制、学术环境方面迸发出崇尚创新、提倡包容、敢于担当的活力。“深圳学派”需要阐述和回答的是中国改革发展的现实问题，要为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立论、立言，对时代发展作出富有特色的理论阐述。它以弘扬和表达时代精神为己任，以理论创新为基本追求，有着明确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追求，不局限于某一学科领域的考据和论证，而要充分发挥深圳创新文化的客观优势，多视角、多维度、全方位地研究改革发展中的现实问题。

四是“深圳表达”：反映了深圳学术文化的个性和原创性，体现了深圳使命的文化担当。它强调关注现实需要和问题，立足深圳实际，着眼思想解放、提倡学术争鸣，注重学术个性、鼓励学术原

创，不追求完美、不避讳瑕疵，敢于并善于用深圳视角研究重大前沿问题，用深圳话语表达原创性学术思想，用深圳体系发表个性化学术理论，构建具有深圳风格和气派的学术文化。

称为“学派”就必然有自己的个性、原创性，成一家之言，勇于创新、大胆超越，切忌人云亦云、没有反响。一般来说，学派的诞生都伴随着论争，在论争中学派的观点才能凸显出来，才能划出自己的阵营和边际，形成独此一家、与众不同的影响。“深圳学派”依托的是改革开放前沿，有着得天独厚的文化环境和文化氛围，因此不是一般地标新立异，也不会跟在别人后面，重复别人的研究课题和学术话语，而是要以改革创新实践中的现实问题研究作为理论创新的立足点，作出特色鲜明的理论表述，发出与众不同的声音，充分展现特区学者的理论勇气和思想活力。当然，“深圳学派”要把深圳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但不等于言必深圳，只囿于深圳的格局。思想无禁区、学术无边界，“深圳学派”应以开放心态面对所有学人，严谨执着，放胆争鸣，穷通真理。

狭义的“深圳学派”属于学术派别，当然要以学术研究为重要内容；而广义的“深圳学派”可看成“文化派别”，体现深圳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地域文化特色，因此除了学术研究，还包含文学、美术、音乐、设计创意等各种流派。从这个意义上说，“深圳学派”尊重所有的学术创作成果，尊重所有的文化创意，不仅是哲学社会科学，还包括自然科学、文学艺术等。

“寄言燕雀莫相嗤，自有云霄万里高。”学术文化是文化的核心，决定着文化的质量、厚度和发言权。我们坚信，在建设文化强国、实现文化复兴的进程中，植根于中华文明深厚沃土、立足于特区改革开放伟大实践、融汇于时代潮流的“深圳学派”，一定能早日结出硕果，绽放出盎然生机！

前 言

冲突作为一种最原始的敌对关系形式，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演进的整个过程。文明的建立、秩序的维护，都意味着漫长、痛苦而又曲折的冲突过程。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巨大伤痛，推动国际社会构建起了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为代表的中心化秩序维护机制。尽管《联合国宪章》没有关于维持和平的明确规定，但维持和平已逐渐发展成为联合国用来实现该宗旨的主要手段之一。1948年以来，联合国已经在数十个国家，包括柬埔寨、萨尔瓦多、危地马拉、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塔吉克斯坦和东帝汶等地，通过广泛开展维和行动，帮助终止冲突和促进和解。但是，冷战后两极格局崩塌所带来的国际局势快速变化，又给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了全新的问题和挑战，大规模战争向局部战争演变、领土争端向宗教斗争、意识形态对立、经济矛盾等多方位冲突演变，“全球政治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多极的和多文化的，（今后）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组织的大规模出现，实质上反映了国际社会和国际法在集体化（collective）、中心化（centralized）方面的新诉求，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际法碎片化、执行薄弱的局面，保障了国际法规范的实施。但是，冷战后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使传统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基础不复存在，传统“威斯特伐利亚范式”的苑囿，又不断使以联合国为核心的集体安全体制陷入两难之地。现代国际冲突的表现形式可能是武装冲突，但也可能只

^①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Simon & Schuster, August 2, 2011.

是武装对峙,甚至可能是非武装冲突。例如2017年6月,沙特阿拉伯和巴林突然宣布与卡塔尔断交,随后在短短的两天时间内,阿联酋、也门、埃及、马尔代夫、利比亚东部政府分别宣布与卡塔尔断交。^①阿联酋要求卡塔尔外交人员于48小时内离境,海湾盟国宣布针对卡塔尔航空(Qatar Airways)封闭空域,沙特阿拉伯全面关闭和卡塔尔边境等迅速而激烈的措施使国际社会意识到,国际法和国际组织不应当成为“等到着火后才购买消防车的消防队”,^②而应当预先建立法治化的冲突解决框架和机制。为应对后冲突时代深刻变化带来的挑战,国际组织必须将关注焦点从传统的解决冲突本身,转移到解决冲突背后的深层次问题上来(特别是冲突后社会的法治重建),进而推动实现国际社会的法治化。

实际上,作为世界和平与安全先行者和维护者的联合国,已经开始意识到后冲突时代法治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并且在维和行动中做出了大量的改革和探索实践。正如联合国《预防武装冲突报告》所说,联合国在冲突社会开展的各项和平行动,为重新建立已遭冲突破坏的和平环境构建了完整的建设框架,而法治建设行动则是和平行动成功的重要保证。联合国已经意识到,防范和解决冲突的发生需要国际社会尽早采取行动。联合国作为最重要的国际组织,在经济、政治上为战后国家、社会的重新建立做出了很多努力,也采取了很多实际措施。这些机制的宗旨是在遭遇过大范围人权破坏的社会中促进和解,并推动改革和社会发展进程,最终目标是缓和紧张状态、重建法治。随着单一维和行动越来越呈现出不足以应对现有国际冲突和威胁的趋势,联合国也在不断扩展其采取行动的方式和范围,综合性的和平手段也逐渐开始形成新的行动体系。

但是,由于联合国自身的弊端以及司法机制本身的复杂性,导致联合国框架下的冲突解决机制也存在着一一定的局限。例如联合国

① 截至2017年6月10日,有9个主权国家政府(巴林、沙特阿拉伯、科摩罗、塞内加尔、埃及、马尔代夫、阿联酋、也门、毛里塔尼亚)已经与卡塔尔断绝了外交关系;有5个国家政府(乍得、约旦、吉布提、厄立特里亚、尼日尔)宣布与卡塔尔外交降级。

② Kofi Annan, <http://www.un.org/en/peacekeeping/issues/military>, visited on 10 July, 2017.

的制裁措施本身就面临着透明度、合比例性等方面的重大争议，而因联合国制裁导致的国家经济困难，甚至可能正是将来冲突的导火索。一方面，联合国制裁措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着维护秩序、保障国际法实施的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联合国制裁措施也受到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较大限制，使大国责任问题在当前国际形势中尤为突出。

作为常任理事国之一，在全球化不断推进的今天，中国与国际社会不仅只是利益共同体，也是安全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因此，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不断推动发展中国家及全人类共同福祉的增进，在后冲突时代中体现应有的大国角色和责任担当，在积极参与全球事务的进程中更好地增进自身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也是中国思考大国责任的重要维度。

2017年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了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指出自中国1971年恢复联合国代表席位以来，“逐步参与裁军、经贸、人权、社会等各领域事务，为重大问题解决和重要规则制定提供了中国方案。近年来，中国积极参与伊朗核、叙利亚等热点问题的对话和谈判，为推动政治解决作出了中国贡献”。

在国际法治进程中，中国积极参与和战后社会相关的国际立法，不仅积极选派自己的代表，而且积极通过书面和口头建议、评论和意见参与国际法律的制定。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中，中国已累计对外提供援款4000多亿元人民币，派出维和人员3万余人次，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出兵最多的国家，也是第二大维和摊款出资国。中国正在用实际行动切实履行作为世界和平与安全机制核心的重要职责，这也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为战后国际法治做出的努力及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贡献。如联合国《预防武装冲突》报告所说，要促进《宪章》所设想的和平、公正的国际秩序，最有希望的方法是建设国家和国际能力，长期采取行动预防冲突，这其中，“各国政府如履行了其主权责任，和平解决可能演化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的局势，并在需要时尽早吁请联合国或其他国际行为者提供预防性援助，则就会为其公民提供免受不希望出现的外来